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保守民主理念 与政治改革探析*

朱传忠

内容提要 作为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主要政治指导理念，保守民主理念涉及国家观、政府观、政治观、民主观、世俗主义观、宗教观、社会观、经济观等多个方面。在该理念指导下，正义与发展党实施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主要涉及1982年宪法、普通法、司法制度、行政机构、文军关系等。就改革成效而言，在土耳其民主得到巩固的同时，困扰该国民主发展的长期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一些做法也受到颇多非议。此外，从文明交往自觉角度观察，正义与发展党的保守民主理念和政治改革遵循着文明交往自觉的基本规律，但“土耳其模式”在中东其他国家不可复制。

关键词 政治治理 土耳其 正义与发展党 保守民主 政治改革

作者简介 朱传忠，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洛阳 471023）。

2002年12月，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下文简称“正发党”，英文缩写为“AKP”或“JDP”），赢得了该国第22次全国大选，并获得了单独组建政府的资格。此后，在2007年、2011年大选中再次胜选，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泽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周边国家宗教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社会稳定和文化安全的影响”（14@ZH02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理念与实践研究”（13CSS020）、河南省教育厅2015年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东国家的伊斯兰政党”（2015-QN-521）和河南科技大学2015年青年项目“伊斯兰政党与中东国家政治”的前期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

个连续3次赢得全国大选的政党；而在2015年6月7日的土耳其大选中，正发党获得了40.66%的选票和258个议席，虽未获得单独组建政府的议会多数，但仍彰显了该党巨大的影响力。伴随着正发党的崛起与上台执政，国外学术界对该党和土耳其发生的新变化进行了全方位考察，涌现了大量成果。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亦开始了相关研究。那么，支撑正发党实行土耳其政治改革的内在机理何在？本文拟在考察土耳其正发党的“保守民主”理念内核的基础上，阐述正发党的政治改革，并从文明交往自觉理论视角予以评价。

保守民主理念的主要内容

在2002年选举前，正发党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识形态，其保守民主意识形态是在执政之后提出的。2004年1月，埃尔多安宣布该党支持“保守主义”，包括多元主义和宽容。^①为推进保守民主理念，正发党于2004年1月10~11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保守民主与世界政治”的国际会议，埃尔多安在会议上阐述了正发党的保守立场。该党理论家、埃尔多安的政治顾问雅尔琴·埃克多安(Yalçın Akdoğan)还专门撰写了名为《正发党和保守民主》的小册子，在土耳其国内公开出版发行，传播该理念。^②

何为“保守民主”？雅尔琴·埃克多安作了最为精辟的论述。在《保守民主政治认同的含义》一文中，埃克多安写道：“20世纪以意识形态世纪著称，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在不同时期成为潮流。一些思想家认为，虽然保守主义的基本哲学和构成要素仍处于持续争论中，但它是能够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媲美的重要意识形态。”^③在这篇文章中，埃克多安总结了保守民主人士的政治观，这种政治观有两个基本点：其一，保守民主赞同有限的、界定清晰的政治权力形式。它不能接受导致压迫国家的威权或极权政治生态。文官或民主政治最大的敌人是威权和极权倾向，如果不加以限制，会出现法律实施中的专断、真正代表参与度的下降、

^① William Hale, “Christian Democracy and the JDP: Parallels and Contrasts”, in M. Hakan Yavuz 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p. 66.

^② Quoted from Yalçın Akdoğan, *AK Parti ve Muhafazakar Demokrasi* (AK Party and Conservative Democracy), Istanbul: Alfa Yayınları, 2004.

^③ Yalçın Akdoğan, “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Identity”, in M. Hakan Yavuz, ed., op. cit., pp. 49–63.

对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无视等现象。其二，保守民主认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人民主权和法治，而其根基是合宪性和普遍接受的规范。这些要素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领导人通过承认全民意志来获得合法性。因此，政治合法性也基于共同认可的民族认同。埃克多安认为，“我们所理解的保守主义并非保护所有现有制度和关系，而只是其中一部分。保守并不意味着反对变革和进步，而是在不失去本性的前提下适应变化”。^①

笔者通过分析该党的纲领、选举宣言、领导人讲话、理论家的著作以及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正发党“保守民主”理念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国家观

正发党的国家观融合了社会国家、宪政国家、民族国家、有限国家等几种影响深远的国家学说。

第一是社会国家观。以社会国家概念为例，该党党纲5次提及这一概念。党纲之公共行政部分有言，“国家有义务承担社会福利职责”。^② 埃尔多安也曾指出，“国家应积极参与制订社会政策，而私人部门应主导经济领域”。^③ 由此，土耳其学者齐亚·厄尼斯和凯伊曼认为，正发党试图“建立国家、经济与社会政策之间的纽带”。^④ 美国著名的土耳其问题研究专家犹他大学学者哈坎·雅乌兹（M. Hakan Yavuz）也认为，埃尔多安视国家为改善日常生活的公共服务的工具。^⑤ 埃尔多安一直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民，其基本职责是消除妨碍实现个人潜能的障碍。^⑥

第二是宪政国家观。正发党支持修宪，认为土耳其可依照社会契约观念，在最大可能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民主、法治标准的宪法。而在2007年选举宣言中，该党正式提出了制定新宪法的主张。目前，土耳其正在为制定一部新的公民宪法而努力。

① Sultan Tepe, “A Pro-Islamic Party? Promises and Limits of Turkey’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M. Hakan Yavuz ed., op. cit., p. 121.

② 正义与发展党党纲（以下简称“党纲”）之公共行政部分，see <http://www.akparti.org.tr/english/akparti/parti-programme>, 2015-05-05.

③ M. Hakan Yavuz ed., op. cit., p. 239.

④ Ibid.

⑤ M. Hakan Yavuz, *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82.

⑥ M. Hakan Yavuz, op. cit., p. 83.

第三是民族国家观。2003年10月12日,埃尔多安在正发党第一次大会上的讲话中,宣称正发党用以妥协与和解为基的政治取代了以冲突为基的政治。他认为保守民主是弥合国家与社会鸿沟、团结中心与边缘的手段,“代表着社会中心”。在他看来,共和观念与民主观念并不冲突。埃尔多安指出,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是共和观念之源,理应是“我们最坚实的基础”。他还强调,宗教、种族、地区民族主义是正发党的“红线”。^①埃尔多安还认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立国原则是共和主义、国家主权、民族国家和世俗主义”。^②换言之,共和国的立国原则在正发党的骨干中已经内化,成为不能被挑战的基本原则。那么,如何保护这些立国原则?埃尔多安称,立国原则需要通过同时保护共和国原则和民主加以实现,而不是仅仅实施有限民主。^③

第四是有限国家观。该党理论家埃克多安称,国家应该运行良好、小且有活力、有效率,应防止政府冗余和浪费。在2002年选举宣言中,正发党宣称国家干预这些制度和价值观(家庭、学校、财产、宗教和道德),会导致冲突和失序。言外之意是,国家不应该干预这些制度和价值观。^④在提及“国家权力”时,正发党领导人谈论更多的是“受限制的政治权力”。在该党领导人看来,国家必须由公民来定义、塑造和管理。^⑤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正发党的保守民主理念包含了自由主义元素,因为该党支持小国家或更小国家主张。^⑥

(二) 政府观

正发党的政府观包括:在政治权威与政治合法性方面,正发党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治理原则,亦宣称政治合法性应以人民主权为基础。即政治权威需要以民众支持为支撑,国家法律、规则和价值观应该符合时代需要并获得民众认同。上述要点在该党的《新土耳其契约》(New Turkey Contract)文件中亦有体现。正发党指出,政治合法性是公民间社会契约和共识关系的

^① William Hale and Ergun Özbudun, *Islamism, Democracy, and Liberalism in Turkey: the case of the AKP*,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25.

^② M. Hakan Yavuz, *op. cit.*, p. 134.

^③ *Ibid.*, p. 135.

^④ 转引自: William Hale, “Christian Democracy and the JDP: Parallels and Contrasts”, in M. Hakan Yavuz ed., *op. cit.*, p. 78.

^⑤ M. Hakan Yavuz, *op. cit.*, p. 91.

^⑥ Evangelia Axiarlis, *Political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in Turkey: Democracy, Reform and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4. p. 90.

产物；公民是政治秩序的最初缔造者，国家只是政治秩序的象征。^①

在政府的职能等方面，正发党认为应秉持有限的政府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正发党强调分权，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财政来源。

（三）政治观

正发党对政治内涵作了不同解读，进而提出了9种不同类型的政治^②：

第一是妥协政治。保守民主认为，妥协文化是政治领域的基础。政治只有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社会差异在政治领域的表达才成为可能。正发党的理论家埃克多安亦认为，“政治应该建立在和解、融合和宽容之上，而非冲突、拉帮结派。为推动政治生活的渐进变革，我们必须保留现有政治架构的某些价值观和特征。”^③

第二是团结政治。正发党把自己定位为在既有价值和原则基础上出现的不同政治传统的个人的集合体。而以宗教、派别或族群认同为中心的认同政治，会造成政治分极化，甚至发生一些极端政治事件。正发党认为所有社会部门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应尝试在民主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支持团结政治，正发党要成为土耳其团结的保障。

第三是政治正常化。正发党提出的政治认同最重要的目标是实现土耳其政治的正常化。十余年来，土耳其政治一直处在源于宗教与政治、传统与现代、宗教与国家、国家-社会-个人关系造成的冲突的阴影下。这些冲突缩小了政治空间，造成了大量问题。正发党尝试重新建构这些关系，实现政治正常化。而该党连续胜选的事实似乎表明已经实现了政治正常化。

第四是有原则的政治。作为一个保守民主人士的政党，正发党能够立即实施真正的、规范的政治，能够在原则、传统之间建立合理的联系，做出符合价值观的政策选择；而在政治治理层面，正发党需坚持其原则立场。

第五是改革主义政治。正发党已经开启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变革和转型运动。该党认为保守主义反对威权和激进变革，它要在渐进和社会动态解读的基础上完成“静悄悄的革命”。而采用极权手段和强力方式改变社会，

① “The New Turkey Contract”，<http://www.akparti.org.tr/upload/documents/2023-sozlesmesi-2015-en.pdf>，2015-05-05。

② 正义与发展党《2023 远景》文件，see <http://www.akparti.org.tr/upload/documents/akparti2023siyasivizyonuingilizce.pdf>，2015-05-05。

③ Yalçın Akdoğan，op. cit.，p. 51。

在历史上造成了负面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影响。^① 正发党理论家埃克多安认为，引入这一概念的目标是为正发党创造独特的政治空间，也为土耳其引入新的政治道路。^②

第六是智慧政治。正发党将以最佳的方式处理问题，积极革除弊病并与其他非法组织做斗争。从塞浦路斯问题到亚美尼亚问题，从民主开放到文军关系，都表明正发党优先选择智慧政治。正发党关注小问题的同时，也全面参与处理大问题。正发党将继续坚持保守民主的政治构想，塑造土耳其的未来。

第七是现实主义政治。长期以来，土耳其政治见证了模糊的、猜疑的、不透明的政治行为和虚假的政治话语。基于以往执政党的履政实践教训，正发党的党纲和施政纲领均结合土耳其发展现实，明确定义与解析了政治之内涵，避免了一些别有用心人士对正发党政治话语的曲解。

第八是服务政治。正发党认为，政治是服务社会的工具，也就是 4 种政治概念或观点当中的“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③ 在埃尔多安看来，政治与服务、改善日常生活和阐述人民诉求有关。^④ 该党的理论家埃克多安也称，正发党的纲领提供的是服务而非认同。^⑤ 正发党的《新土耳其契约》第一条有言，“所有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必须服务于人民需求，反映超越时空的、变化的环境和诉求，而那些不能为人民服务、回应社会诉求变化的政治秩序，不会持续长久。”^⑥ 该文件第 34 条和第 35 条亦声称，国家机构和机关不是向人民强加霸权的部门，必须为人民服务。如此，人民得以掌控国家，国家成为人民的仆人。^⑦ 哈坎·雅乌兹（M. Hakan Yavuz）也提到，“在土耳其个案中，我们见证了后伊斯兰主义过程或从认同政治向服务政治的转型”。^⑧

① Yalçın Akdoğan, op. cit., p. 51.

② Ibid.

③ 关于 4 种概念或观点，参见燕继荣主编：《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2~33 页。

④ M. Hakan Yavuz ed., op. cit., p. 18.

⑤ Yalçın Akdoğan, op. cit., p. 52.

⑥ 《新土耳其契约》第一条，参见正义与发展党英文网站：<http://www.akparti.org.tr/upload/documents/2023-sozlesmesi-2015-en.pdf>, 2015-05-05。

⑦ 《新土耳其契约》第 34、35 条，参见正义与发展党英文网站：<http://www.akparti.org.tr/upload/documents/2023-sozlesmesi-2015-en.pdf>, 2015-05-05。

⑧ M. Hakan Yavuz, ed., op. cit., pp. 2-3.

第九是清廉政治。为了与之前的政党进行区别，正发党领导层提出了新的与“政治中心”相对的“社会中心”概念。由此，正发党表明了其使命和原则是正义、发展和清廉政治。该党负责组织事务的副主席哈亚提·亚泽哲（Hayati Yazıcı）称，在前两次大会期间，“正发党对任何被指控有腐败行为的人均零容忍”。^①由此可见，“清廉政治”是该党领导层呼吁的“新政治风格”的重要体现。

（四）民主观

自1946年实行多党制以来，土耳其多党民主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发展历程。然而，该国民主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那么，正发党是怎么看待民主问题的呢？该党又提出了怎样的民主主张？综合该党的主要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该党的民主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主是什么，民主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民主是一种宽容、对话和谈判机制，其中的法治和治理原则由人民的意志所塑造。正发党认为，权利、自由、平等、宽容是当代民主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该党的纲领和选举宣言中都多次提及这些理念。以平等为例，正发党主张，土耳其公民不论性别、族群、信仰和观念如何，一律平等。因此，该党目标之一是“发展公民身份意识，国民共享属于国家的荣誉。”^②以自由为例，在党纲“基本权利与政治原则”部分提到，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压迫是不可接受的；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是实现社会安定、人民能够接受民主制度的基本条件。^③

第二，何为发达民主？如何实现发达民主？在土耳其《2023年远景》中，正发党把发达民主体义为“一种制度化的自由民主，其中个人不可缺少的、不可转移的、不受侵犯的权利和自由应能够实现并得到保护，不受到各种国家权威的侵害。发达民主中的公民意志对国家制度有直接影响，它不仅通过选举，而且通过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决策与管理来体现。”^④该党旨在达到发达民主标准，希望成为有良好制度支持的强大民主的样板。

① Güliz Dinc Belcher, “Journey from Islamism to Conservative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Party Moderation in Turkey”,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February 2012. pp. 240 - 241.

② 党纲前言部分。

③ 党纲前言部分。

④ 正义与发展党《2023远景》，第9页。

第三,主张参与民主。正发党认为民主是一个推动和促进人民广泛参与的过程。该党的理论家埃克多安亦认为,真正的民主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被涉及并讨论,所有的社会诉求都能够被倾听,所有的社会发展项目都能够被监察。^① 正发党的《新土耳其契约》文件指出,自由、透明的选举仍将是土耳其政治稳定的核心内容。在此种意义上,选举政府官员和竞选公职的权利不能被限制、僭越或忽视。^② 而该文件第44条则指出,要开拓新的参与渠道,巩固参与民主,在基层实施地方自治原则。此外,正发党纲领还特别提及公投这种选举方式,公投作为一种工具应给予足够重视。人民意志不仅仅限于在选举中投票,而且民众能参与公决。

第四,支持多元主义民主。正发党的民主是多元主义的,不同于繁荣党的多数人民主。该党认为,不同政治选择之间的竞争是健康民主体制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③ 宪法保护少数派的权利是强化多元民主的一个要素。该党纲领多次提到加强公民社会组织的必要性,提高它们在中央和地方政策制定中的地位。^④ 正发党认为,土耳其社会的异质性能够丰富多元主义民主。^⑤

第五,入盟与推进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加入欧盟一直是土耳其多年来的梦想。实施符合欧盟标准的改革常与推进土耳其国内民主化联系在一起,欧盟标准是否内化成为检验土耳其民主水平的重要标尺。正发党认为,入盟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自然结果”,“欧盟经济和政治标准的实现是土耳其国家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⑥ 2004年,时任土耳其外长的阿卜杜拉·居尔表示,“我们完全认识到推进改革符合土耳其本国的利益。这亦会惠及我国人民。土耳其改革进程还未完成,改革之路不可逆转。”^⑦ 因此,加入欧盟、实施欧盟的规范和制度是巩固土耳其化民主的重要外部推力。

(五) 世俗主义观

世俗主义是理解土耳其政治发展史的关键词之一,也是最受争议的术语

① Yalçın Akdoğan, op. cit., pp. 50 - 51.

② 《新土耳其契约》第39、40条, see <http://www.akparti.org.tr/upload/documents/2023-sozlesmesi-2015-en.pdf>, 2015-05-05.

③ William Hale and Ergun Özbudun, op. cit., p. 21.

④ Ibid.

⑤ Yalçın Akdoğan, op. cit., pp. 50 - 51.

⑥ William Hale and Ergun Özbudun, op. cit., p. 23.

⑦ Leman Sinem Topcuoğlu, “The ‘Conservative Democracy’ Identity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the Turkish Center - Right Tradition”,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Thesis, December 2006, p. 100.

之一。土耳其政界、学界和西方学界都对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演变做出了不同解读。那么，保守民主的世俗主义观是怎样的呢？正发党纲领有言，“为了政治、经济和其他利益而利用宗教，或利用宗教向那些不同思想和不同生活的人施加压力，也是不能被接受的。”^① 而埃尔多安的这段访谈，充分地展现了其对世俗主义的解读：世俗主义，作为社会和平与民主的关键保障，是一个拥有两个维度的概念。世俗主义的第一个维度是国家不应该依照宗教法律组建，这需要一个标准的、统一的、不可分的法律秩序。世俗主义的第二个维度是国家应该是中立的，对各种宗教信仰保持同等距离，应该是个人宗教和信仰自由的保障。^② 埃尔多安总是强调他们对民主，甚至西方模式的世俗主义体制持欢迎态度。实际上，在正发党的实践中，伊斯兰的作用常常被降至个人层面。

土耳其议长、正发党党员阿林奇认为，在土耳其，世俗主义应该以一种更为自由的方式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强调个人宗教权利和自由。对他而言，这种新的世俗主义版本强调土耳其处于文明十字路口的事实。一方面，土耳其是西方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口主要是穆斯林。在阿林奇看来，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应该考虑这种双重社会文化背景。他强调，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的重新解释和真正实施，会对全世界世俗主义辩论做出巨大贡献。^③ 同时，阿林奇在议会讲话中，还声称世俗主义应该是社会和平与妥协的机制，世俗主义要求国家对各种信仰保持中立。^④ 正发党的理论家埃克多安则认为，土耳其的世俗主义需要通过民主变得更强大，以更好地保护宗教自由。对他来说，“对世俗主义的特别解读，即凯末尔主义者的世俗主义，是专断的、极权的、雅各宾式的意识形态或生活方式，它会导致冲突而非社会和平。”^⑤ 正发党党员亦赞同美国类型的世俗主义，这种世俗主义对思想自由非常敏感，把宗教价值观解释为指导社会行为的道德价值观。

正发党政治家对世俗主义的理解是矛盾的。与多数中右政党一样，正发党认为世俗主义并非旨在塑造公民的日常生活或认同全面的公共政策。相反，

① 党纲第一部分。

② M. Hakan Yavuz, *op. cit.*, p. 159.

③ Leman Sinem Topcuoğlu, *op. cit.*, pp. 95 - 96.

④ M. Hakan Yavuz, *op. cit.*, p. 161.

⑤ Leman Sinem Topcuoğlu, *op. cit.*, p. 96.

世俗主义是设计用来保护宗教自由和实践不受国家影响的宪法原则。^①同时,正发党的政治家还认为世俗主义在土耳其已经内化,凯末尔所确立的立国原则必须予以捍卫。但其捍卫的世俗主义原则却不同于激进世俗主义,而是土耳其穆斯林版本的世俗主义。

(六) 宗教观

正发党的宗教观主要涉及宗教的地位、宗教与政治、宗教与国家的关系等方面。第一,正发党明确界定了宗教的地位及其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正发党认为,宗教(伊斯兰教)是“社会实体和传统的一部分”,与民主是兼容的。该党的布尔萨议员埃尔图格鲁尔·雅尔琴巴耶莱暗示,正发党的目标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改造文化价值观,即作为政治认同的伊斯兰是能够被接受的,而非仅仅把宗教降为意识形态。^②正如该党前主席埃尔多安所言,“正发党的前身以‘政治共同体’形式及意识形态为基础,只吸引这种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这种政治是危险政治,因为它导致两极化,划清了宗教与政治的界限。以宗教之名成立政党对宗教是不公正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应该是维持世俗体制。”^③在沙特参加一个商业会议时,埃尔多安称,“我不认为伊斯兰共同市场的概念能够被接受。不论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把政教关系建立在族裔和宗教基础上。如果我们开始建立这些制度,土耳其就会出现极端化情况。”^④

第二,正发党肯定了宗教价值观的重要作用。雅乌兹认为,对正发党的领导层来说,伊斯兰是土耳其人民的认同、道德源泉以及土耳其国家的合法性渊源。换言之,伊斯兰是民族纽带、认同根源和合法性的主要渊源。^⑤而艾娃吉利娅·阿夏尔丽丝(Evangelia Axiarlis)也认为,在该党的保守民主理念中,伊斯兰是文化标识(Cultural Marker)。^⑥

(七) 社会观

正发党对社会的认识主要涉及社会多样性、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

① M. Hakan Yavuz, *op. cit.*, p. 160.

② Leman Sinem Topcuoglu, *op. cit.*, p. 79.

③ *Ibid.*, p. 80.

④ *Ibid.*

⑤ M. Hakan Yavuz, *op. cit.*, p. 96.

⑥ Evangelia Axiarlis, *op. cit.*, p. 100.

第一，正发党承认社会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不同社会、族群、政治和宗教认同被认为是财富之源，而非威胁。该党2002年选举宣言称，正发党不仅承认差异，而且鼓励他们以其认同参与政治。在2015年4月公布的《新土耳其契约》中，正发党指出，土耳其的族群、宗教、派别、地域多样性反映了我们共有的、丰富的古老历史遗产，是所有公民作为国家的平等、合法主人的最坚实基础。^①

第二是关于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政治领域以文化和解为基础，这是因为：以和解为基础，政府可以在政治领域解决社会差异与分歧。各种社会文化集团就能够参与政治，而由民主多元主义产生的宽容政治，会增加公共辩论的多样性。因此，土耳其政治过程容纳不同集团和声音，可以推进参与民主。^②

第三是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发党主张要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该党的《新土耳其契约》文件提到，公民社会是参与民主和多元民主的基础，基于此，政府应消除公民社会积极参与民主治理的各种障碍。^③

第四是关于社会正义观。正发党支持社会正义，强调传统，特别是那些与家庭有关的传统。^④2004年9月，土耳其议会就通奸定罪进行讨论时，埃尔多安称，“对我党而言，家庭是神圣的制度。家庭越强，民族越强。如果家庭被削弱了，民族注定会毁灭”。^⑤

(八) 经济观

这里所说的经济观，并非具体的经济政策，而是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来论述的。第一，强大的经济有利于土耳其民主建设。正发党领导人指出，他们优先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而非宗教问题。在埃尔多安看来，为建设繁荣的国家和捍卫民主，土耳其需要以强大的经济为根基，优先处理经济衰退、失业、不平等收入分配、政治自由、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体系等最紧迫的问题。因此，正发党提出了三大战略：一是通过实行私有化和吸收外国投资，“实现土耳其经济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二是强调经济生活去官僚化，给国

① “The New Turkey Contract”, <http://www.akparti.org.tr/upload/documents/2023-sozlesmesi-2015-en.pdf>, 2015-05-05.

② Yalçın Akdoğan, *op. cit.*, p. 50.

③ 《新土耳其契约》第45条, <http://www.akparti.org.tr/upload/documents/2023-sozlesmesi-2015-en.pdf>, 2015-05-05.

④ Ahmet Insel, “The AKP and Normalizing Democracy in Turkey”,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ume, 102Number2/3, Spring/Summer 2003, p. 298.

⑤ M. Hakan Yavuz, *op. cit.*, p. 168.

民经济增添活力；三是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社会维度”和“社会正义”等因素。^① 第二，正发党承认民主、法治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该党的《新土耳其契约》文件指出，“目前，所有现代案例都表明一国经济发展与民主和法治直接相关。”^② 换言之，在缺乏明确、透明的法律规定时，一国吸引长期投资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正发党要保持和推进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助联系。^③

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政治改革实践

自2002年执政以来，从所涉及的领域来看，正发党政府的政治改革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修宪与制宪

截至2012年，土耳其已对现行的1982年宪法已经进行了17次修改，其中的7次修改都是在正发党执政时期。^④

2007年，土耳其国内围绕宪法问题发生了宪法危机。在宪法危机发生后，致力于改革的正发党在2007年议会选举宣传中，提出了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政治承诺，预示着土耳其的宪法政治发生了从修宪到制宪的大转变。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2011年10月19日正式启动了制宪进程，计划到2012年年底公布新宪法草案，然而，到截止日期，土耳其的制宪进程并未完成。制宪成为土耳其国内各种力量博弈的舞台，总统制是各方争论的焦点。2012年11月，正发党就政府体制问题向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提出建议，主张实行总统制，而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反对实行总统制，结果造成委员会运转危机，^⑤ 并导致新宪法草案流产。

① Leman Sinem Topcuoğlu, op. cit., pp. 109 - 100.

② 《新土耳其契约》第66条，<http://www.akparti.org.tr/upload/documents/2023-sozlesmesi-2015-en.pdf>, 2015-05-05。

③ 《新土耳其契约》第67、68条，<http://www.akparti.org.tr/upload/documents/2023-sozlesmesi-2015-en.pdf>, 2015-05-05。

④ 朱传忠：《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修宪政治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2期，第107~120页。

⑤ Gözde Burcu Ege, “A Chronology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01 - 31 December 2012”, <http://turkeyconstitutionwatch.org/index.php/a-chronology-of-the-constitutional-conciliation-commission-01-31-december-2012-gozde-burcu-ege/>, 2015-03-14.

制宪进程中的总统制之争一直延续至今。2015年2月3日，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极力反对总统制，该党领导人科勒迟达奥卢称，只要共和人民党存在，就坚决反对实行总统制。^①而正发党依然不遗余力地支持总统制。2015年2月4日，土耳其总理奥卢在接受土耳其电视台第七频道采访时称，一些人认为总统制会催生威权主义，其证据是什么？那些有政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总统制和议会制下都能实施民主。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两者都被描述为民主体系。威权倾向亦可能来自议会制，阿道夫·希特勒就是明证。^②而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也为正发党加油鼓劲，称2015年6月7日是土耳其人民展现其支持新土耳其意志的日子。他号召人们支持正发党，使其获得修改宪法的多数支持。^③然而，6月7日的选举结果表明正义与发展党并没有获得修改宪法的多数支持，亦未获得单独组建政府的资格，只能求助于其他3个政党来组建联合政府。换言之，土耳其将出现一个怎样的政府，还需各方的协商与博弈。同时，联合政府能够支撑多久，土耳其是否会举行提前大选，亦是未知。而就制宪进程的未来趋势而言，总统制问题仍将是土耳其各方争论的焦点，议会各政党很难就此问题达成一致。

（二）普通法改革

普通法改革是正发党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土耳其司法部的《土耳其司法改革报告》显示，2002~2004年，联合政府和正发党政府先后实施了9个一揽子改革方案，内容涉及表达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废除死刑、禁止虐待、少数民族权利、国际人权保护、文军关系等。^④如2004年7月的《土耳其结社法案》规定，协会不经审批，可接受外国援助，或与之合作及举办活动；协会无需告知当地政府官员组织集会的时间和地点，也无需邀请政府官员与会；非政府组织可开设海外代表处；没有法院传票，安全部队不再限制协会；取消对学生会的限制；15岁以上儿童可组建协会；

① “US System too Limiting for Turkey: President”,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us-system-too-limiting-for-turkey-president.aspx?pageID=238&nID=77916&NewsCatID=338>, 2015-03-14.

② “Presidential System not the Source of Dictatorship: Turkish PM Davutoğlu”,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presidential-system-not-the-source-of-dictatorship-turkish-pm-davutoglu.aspx?pageID=238&nID=77923&NewsCatID=338>, 2015-03-14.

③ “US System too Limiting for Turkey: President”, *op. cit.*

④ Ergun Özbudun and Ömer F. Gençkaya,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 – making in Turkey*,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pp. 73-79.

非政府组织可提出临时纲领或倡议；允许非政府组织买卖不动产。^①

正发党政府的部门法改革几乎涉及土耳其的所有法律，如刑事法律、民事法律、经济法律（包括银行法、商法、外国直接投资法）、公共行政法律、市场方面法律以及其他方面法律等。以高法为例，2011年1月13日，土耳其议会通过了《新土耳其高法》，并于2012年7月1日开始生效。

（三）行政机构改革

正发党政府试图实现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变革，将中央政府的一些职能转移给地方政府，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正发党的纲领认为，“公共管理的基础是服务人民。对中央政府而言，最关键的是更好地服务公民、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② 而从实践层面看，行政机构改革主要包括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两个方面。

第一，改革中央政府行政机构。居尔政府时期，正发党成功地改组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由文职官员担任该委员会主席。2011年6月，埃尔多安大选获胜后，宣布取消8个国家部长职位，将中央部委数量调整为25个，并更换了几个中央部委的名称。例如，依照2011年6月的第641号行政令，成立于1960年的国家计划组织（SPO）被重组为国家发展部；为鼓励外国投资，土耳其政府宣布在总理府下设投资支持与促进局（ISPAT）；为推进该国人权事业，在总理府下设人权事务办公室。此外，为推动入盟进程和入盟谈判，土耳其还专门成立了欧盟事务部。^③

第二，改革地方行政机构。土耳其地方行政改革主要采取立法和行政命令两种方式，前者主要包括2005年通过的特别省行政法、市政法，后者主要包括2006年以来成立的地区发展署。

其一，正发党地方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式通过议会立法推动地方行政体制改革。2005年土耳其议会先后通过了《特别省行政法》（第5302号法令）、《市政法》（第5393号法令），以通过法律方式确保地方自治权利。例如，《市政法》第八条规定了协商参与权；第九条规定地方行政单位——市、区之间的关系：市政管理部门关注所辖区居民的诉求，通过财政资金拨款扶植辖区的发展；第13条规定当地居民有权参与市政决策，市政委员会是市政的决

^① William Hale and Ergun Özbudun, op. cit., p. 59.

^② 党纲第四部分第二小节中央政府。

^③ 土耳其欧盟事务部网站：<http://www.abgs.gov.tr/index.php?l=2>, 2015-03-14。

策机构，由居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等等。

其二，成立地区发展署，协调地区发展。自2006年以来，土耳其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了26个地区发展署，如伊斯坦布尔发展署、安卡拉发展署、伊兹密尔发展署、西地中海发展署、东马尔马拉发展署、东黑海发展署、东南安纳托利亚发展署和北安纳托利亚发展署等。

（四）司法机构改革

司法机构改革是正发党执政时期土耳其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司法机构改革，土耳其各政府部门之间通过协调与沟通，制定了多个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土耳其国家计划组织制定的第九个发展计划中专门论及司法改革战略。^①

2009年，土耳其司法部公布了“司法改革与行动计划战略”（Strategy for Judicial Reform and Action Plan）。该文件勾画了司法改革的战略目标：加强司法机构独立；实现司法机构的中立性；改善司法机构的效率和效用；提高司法机构中人员的职业能力；发展司法机构的行政体系；便利诉诸司法；完善判决执行制度，等等。^② 2011年，土耳其司法部又颁布了新的“司法战略文件”（2010~2014），其中阐述了土耳其司法改革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③ 这些司法改革方案均涉及综合性法律，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两大基本目标：一是通过缩短审判周期，加快司法结果的实施；二是开启人权领域的改革，特别是公正审判权、媒体和个人自由。^④ 此外，土耳其政府还欲通过改变基本法律规定，实现与欧盟标准的对接。

在“司法改革与行动计划战略”的指导下，2011年3月31日，土耳其公

^① 2006年6月28日，第九个发展计划（2007~2013）（第877号）是最重要的文件，决定土耳其未来7年的发展战略，在“改善司法体系”部分，在展现近年来的发展和不足之后，强调当前司法的需要。据此，在第9个发展计划框架下，研究成立由大学、司法机构、公民社会和司法部参加的“司法机关特别专家委员会”（Special Expertise Commission of Judicial Service）准备报告以决定具体措施。参见第九个发展计划英文本：İsmail Aksel, *Turkish Judicial System*,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Turkey, The Department for Strategy Development, Ankara, 2013, <http://www.justice.gov.tr/judicialsystem.pdf>, 2015-03-14。

^② Turkish Ministry of Justice; *Judicial Reform Strategy*, Ankara, 2009, p. 11; Naim Karakaya Hande Özhabeş, *Judicial Packages: An Evaluation With Respect to Rights and Freedoms*, November 2013. p. 8. <http://www.tesev.org.tr/assets/publications/file/06122013161517.pdf>, 2015-03-14。

^③ Ministry of Justice Strategic Plan (2010-2014), pp. 32-35。

^④ Naim Karakaya Hande Özhabeş, *Judicial Packages: An Evaluation With Respect to Rights and Freedoms*, November 2013, p. 9。

布了第一个司法改革方案——《为加快提供司法服务的目的而修订的若干法律》，即第6 217号法令，该法令由33个条款和4个临时条款组成。该方案直接导致其他17部法律的修改。2011年8月26日，土耳其政府又以政府行政令方式通过了第二个司法改革方案，该方案由44个条款组成，内容主要涉及司法部的结构设置和司法机构的行政管理。然而，其中的一些条款被宪法法院驳回，仍然有效的条款包括：在司法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署之下成立了人权司，修改了国家委员会法、上诉法院法、法官与检察官法、司法学院法、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法。2012年7月2日，土耳其公布了第三个司法改革方案——《修改若干法律以改善司法服务的效率和媒体犯罪中审判和判决的延迟》，即第6 352号法令。该法令包括107个条款和3个临时条款。为加快审判过程，第三个司法改革方案修改了有关破产和债务实施的审判、犯罪案件、行政法律案件。2013年4月11日，土耳其公布了第四个司法改革方案——《修改与人权和表达自由若干相关的法律》。该法案由27个条款组成，关注人权领域的修改，修改了反恐法和土耳其刑法。^①

（五）文军关系的调整与变化

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军队一直扮演着世俗体制保护者的角色，曾经4次成功干政，且密谋或发动过多次不成功的政变。正发党上台后，力图实现对军队的完全控制。在欧盟标尺和国内民众的“反监护体制”诉求的共同推动下，正发党通过立法改革（改革国家安全委员会）、司法改革和审判（军队法院、艾尔盖内孔案）、立法机构调查（成立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方式实现了对军队的控制，推动了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和政治现代化进程，达到了欧盟有关文军关系的标准。

必须指出的是，当下，军队依然能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机制对土耳其政治产生重要影响。2011年7月29日，在与埃尔多安就案件审判问题发生分歧后，土耳其总参谋长称总计有250名军官（173名现役，77名退役）被逮捕，称这些逮捕行动违反法律原则、公正、正义和良知。^②他与陆、海、空司令集体请求辞职，^③但政府很快平息了风波，短时间内任命了新的总参谋长和各军

^① Naim Karakaya Hande Özhabeş, op. cit., pp. 9 - 10.

^② Dr. Uğur Burç Yıldız, “Civil - Military Rel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Turkey”, *Ege Stratejik Araştırmalar Dergisi*, Cilt 3, Sayı 2, 2012, pp. 33 - 34.

^③ 在集体辞职前，将军们要求埃尔多安延长这些军官们的任期，被埃尔多安拒绝。

种司令。欧盟认为该事件表明土耳其正成为更加民主的国家。^①一些学者称，这是“土耳其的夏日革命”，土耳其高层军官的集体辞职预示着该国文军关系的巨大变化。^②土耳其《民族报》的专栏作家阿斯利·阿伊丁塔什巴什（Asli Aydintasbas）称，“这有效地终结了军队在土耳其民主中的作用，这是土耳其第一共和国终结和第二共和国开始的标志性时刻。”^③从目前形势看，土耳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文官精英对军队精英的民主统制，军队精英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

对正义与发展党保守民主及其实践的相关评价

在阐述正发党的保守民主理念和政治改革实践后，本文尝试从文明交往自觉理论的角度提出如下相关思考。

第一，土耳其正发党产生于土耳其历史的转折时期，把握住了世纪之交土耳其历史发展的主题。按照文明交往的规律，转折时期大都发生在时代的交叉点上；转折时期，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期。^④而世纪之交的土耳其亦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外有全球化和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入盟进程，内有地震灾害、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土耳其各派政治精英做出怎样的选择至关重要。在这一转折时期，如何处理好全球与本土、挑战与应战、冲突与整合、有序与无序之间的关系，亦显得至关重要。从这一角度看，土耳其正发党做出了正确选择，提出了“渐进性改革”的政治主张，延续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实现了土耳其外交的突破性发展。换言之，正发党秉承的是“延续性变革”理念，而非“断裂性变革”理念，实现了土耳其历史进程的“延续中的变革”和“变革中的延续”。但必须指出的是，正发党的各种主张还存在矛盾之处，实现传统与现代性的完美融合并非易事。以正发党的保守民主意识形

① Dr. Uğur Burç Yıldız, op. cit., p. 34.

② Dietrich Jung, “The Turkish Revolution: Changing Civil – military Relations in Turkey”, <http://static.sdu.dk/mediafiles/D/A/0/%7BDA0B0720-64CB-4336-899E-D951382A7F9D%7DDJ1110.pdf>, 2015-03-14.

③ Aliye Pekin Çelik and Laura Elizabeth Çelik, “Turkey: Current and Futur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Trends”, <http://www.cdfai.org/PDF/Turkey%20Current%20and%20Future%20Political,%20Economic%20and%20Security%20Trends.pdf>, 2015-03-14.

④ 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9页。

态为例，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造成了构建政治大联盟的困境。总之，我们可以认为，正发党的崛起是建立在土耳其社会自身演化的内在逻辑之上的，是土耳其文明演进连续过程中的一个阶段。^①

第二，正发党的政治改革实践，呈现了一国内部多维交织的复杂交往图景。文明交往自觉论认为，冲突与整合是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矛盾和协调的不同侧面，无冲突便无整合，无整合难以化解冲突。同时，冲突作为一个过程，也有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整合的作用。冲突和整合是交替存在和相互转化的，抗拒 - 碰撞 - 渗透 - 冲突 - 渗透是常见的交往过程。^② 在政治改革领域，土耳其各种力量（政党、军队、司法机关、公民社会组织）围绕修宪与制宪问题、2007年4月的政治危机、头巾禁令问题、宗教学校教育问题、2013年大规模抗议活动和政府腐败问题、2015年的安全法案之争、库尔德问题、阿拉维派问题、文军关系问题等诸多棘手问题上演了“和”与“斗”、“分”与“合”的“冲突与整合”大戏，展现出一国内部交往复杂多变的多维交织图景。

第三，正发党在与土耳其国家、反对党、社会行为体的交往互动过程中，“实践”了文明交往自觉论的“交往互变”的基本状态。在这一交往互动过程中，正发党、土耳其国家、反对党、社会行为体都发生了变化。其一，文明交往中的“八项变化”在这一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以内化和外化为例，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已经逐步内化，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已经在土耳其生根，这些“内化的标准”亦成为当前其他中东国家的效仿榜样。^③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哥本哈根标准已经成为正发党巩固民主和强大公民社会的口号。^④ 再如，在土耳其民主化、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和正发党转型的影响下，老牌的中左政党共和人民党开始向政治光谱的中间靠拢，力图重新塑造政党形象。这一互动过程亦证明了彭树智先生所主张的“多元化不是并列杂糅，不是没有差异；尤其互动中的理论强弱，多元与一元、个人身份与他者、

① 这里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表述，参见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费宗惠、张荣华编：《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② 彭树智著：《文前交往论》，第37页。

③ 在人权标准是否内化问题上，学者是存在争议的。土耳其学者伊赫桑·达厄认为，为寻求制度合法性和安全，正义与发展党是实现了人权的工具化而非内化，通过承认人权以自保的工具化，也有可能使人权的制度化。In M. Hakan Yavuz ed., op. cit., p. 89.

④ M. Hakan Yavuz, op. cit., p. 47.

民族国家与世界全球是在差异的前提下互变的。这种结果是辩证的互动关系。”^①其二，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已经被大多数土耳其选民“内化”。土耳其出现的新中产阶级——安纳托利亚商人——自视自己积极支持传统价值观，并将其与全球构想融合在一起。^②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当前并非凯末尔主义国家精英或旧式的商业和城市世俗主义者是土耳其“现代化的实施者”，而是内陆城市如科尼亚的私人企业家。其三，土耳其各政治行为体在土耳其的现代化、民主化、欧洲化进程中，主张和地位都发生了“反转”，甚至“相互异化”。代表“温和伊斯兰”的正发党放弃先前“反西方、反世俗、反全球化”的主张，实现了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融合，积极推动土耳其的民主化、欧洲化进程；而传统政党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则站在了“历史的反面”，反对加入欧盟、反对民主化改革、反对以民主方式解决库尔德问题。代表“边缘力量”的新式精英正发党和代表“中心力量”的旧式精英传统政党在交往互动过程中“相互异化”，土耳其民主巩固在向前进的同时，也充满了危机和不确定性。2007年的总统选举危机、2008年的正发党未遂取缔案、2013年6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和2013年12月的政府腐败危机，就是明证。

第四，“土耳其模式”对地区国家具有示范效应，但不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复制。中东剧变后，新版“土耳其模式”成为地区国家和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土耳其模式”在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伊斯兰国家是不可复制的，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土耳其现代史与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史差异较大。土耳其从未丧失独立，该国的西方化是具有国内合法性的自觉选择。而且，土耳其独立的巩固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相重合，不用与中东泛伊斯兰或泛阿拉伯主张相竞争。其次，土耳其拥有较长的民主发展史和世俗主义史，土耳其的宪政制度现在运行良好。而阿拉伯国家则要发展新规范和构建新认同。土耳其拥有强大的世俗主义历史。“土耳其模式”调和伊斯兰与现代性的特征，有助于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温和化，并能躲避更加强大的世俗力量的压制。再次，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在称赞“土耳其模式”的同时，并不赞同采取“土耳其模式”。在阿拉伯伊斯兰主义集团中，正发党样板被认为是温和化、实用主义、

^① 彭树智著：《我的文明观》，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2页。

^② Meltem Müftüçü - Baç and E. Fuat Keyman, "The Era of Dominant - Party Politic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3, No. 1, January 2012, pp. 85 - 99.

良治以及伊斯兰、民主和现代性之间趋同的缩影。^① 突尼斯的格努西称赞土耳其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限制了军队对人民意志的监护，也称赞其公开挑战以色列。但当谈及采取“土耳其模式”时，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均持谨慎态度。比如，摩洛哥政府发言人穆斯塔法·哈利夫（Mustafa Khalfi）强调两国之间的差异，指出土耳其世俗主义和摩洛哥国王宗教合法性的差异，决定了伊斯兰之间的不同互动和各自国家的现有秩序。^② 摩洛哥现政府的司法部长穆斯塔法·拉米德（Mustafa Ramid）亦声称，“在土耳其，伊斯兰参照系能够在完全世俗的框架下运行。在摩洛哥，我们生活在伊斯兰宪法（第三条和第41条）和伊斯兰框架下。然而，实践是世俗的。国家有宗教参照，我党亦有伊斯兰参照”。^③ 再如，埃及自由与正义党的议员埃萨姆·埃连（Essam El - Erian）称，世俗主义是“埃及人中间非常坏的概念”，“我们不需要这一概念”。^④ 最后，“土耳其模式”本身亦有缺陷。雅乌兹认为，把土耳其作为伊斯兰民主样板是有问题的，土耳其实验不可能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复制。土耳其依然没有彻底解决有关将政治伊斯兰融入体系的多个重要问题。^⑤ 换言之，正发党塑造的“民主模式”还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⑥ 以认同政治为例，考虑到还未解决的问题，如库尔德问题、亚美尼亚问题和世俗宗教分野，认同政治可能仍将是土耳其政治认同的一部分。^⑦ 总之，每一个地区国家拥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有着不同于土耳其的国内和地区环境，在这些国家复制“土耳其模式”并不现实。阿拉伯国家可以在借鉴“土耳其模式”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探寻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第五，土耳其未来的变化方向取决于土耳其各派力量之间的分化组合。国外学者预测了土耳其未来发展的几种前景，如更加保守的社会、民主和谐、军队回归等。而国内学者也意识到新版“土耳其模式”的局限性和过渡性特

① Feriha Perekli,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urkish Model’ to Morocco: The Case of the Parti de la Justice et du Développement (PJD)”, *Insight Turkey*, Vol. 14, No. 3, 2012, pp. 85 - 108.

② Feriha Perekli, *op. cit.*, pp. 85 - 108.

③ *Ibid.*, p. 92.

④ Halim Rane, “An Alternative to the ‘Turkish Model’ for the Emerging Arab Democracies”, *Insight Turkey*, Vol. 14, No. 4, 2012, pp. 50 - 51.

⑤ M. Hakan Yavuz, *op. cit.*, p. 115.

⑥ 王林聪：《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民主模式”》，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8期，第20~25页。

⑦ M. Hakan Yavuz, *op. cit.*, p. 117.

征。^① 在笔者看来，土耳其未来的变化方向取决于土耳其各派力量之间的分化组合。其一，世俗派、保守派与库尔德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以及微弱平衡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正发党的多项“变革政治”已经搁浅，正发党政府亦未能摆脱“腐败魔咒”，陷入了腐败丑闻和政府危机，2013年6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和2013年年底的腐败危机就是明证。而世俗派、保守派、库尔德力量在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如何重构土耳其官方意识形态是判断土耳其模式未来走向的重要指标。其二，新宪法进程会对“土耳其模式”产生关键影响。2011年正式启动的制宪进程并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土耳其国内各种力量在制宪问题上分化组合频繁，在未来的国家体制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因此，新宪法的制定将是判断“土耳其模式”走向定型的重要标志。^② 其三，土耳其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对外依附性逐渐增强，亦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2008~2010年该国经济发展受挫就是明证。正如学者所言，新版“土耳其模式”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增长和繁荣。如果土耳其经济出现问题，其样板作用也会大打折扣。而自2012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以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汇率为例，2013年5月至2014年1月底，里拉对美元累计贬值幅度达到29%，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2.39里拉的历史低点。^③ 而进入2015年以来土耳其里拉再次大幅贬值，贬值幅度接近10%；根据土耳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3月，土耳其的失业率为10.6%，总失业人数为369万人。^④ 其四，2015年6月7日大选的结果更好地说明了土耳其国内各派力量之间的分化、矛盾与斗争。根据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最终选举结果显示，正义与发展党的得票率为40.66%，获得了258个议席；而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人民民主党的得票率分别为25.13%、16.45%和12.96%。正义与发展党并未获得组建一党政府的绝对多数，若不出意外，现任总理奥卢仍会获得组建政府的授权，但选择与哪个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将成为该党面临的首要问题，甚至有组建政府失败的可能。但不论哪些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土耳其

① 王林聪：《“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第96页。

② 同上文。

③ 《土耳其本币里拉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下跌威胁经济前景》，参见新华网：http://jjckb.xinhuanet.com/2014-02/21/content_492599.htm，2015-06-08。

④ Unemployment drops to 10.6 percent in March, June 15, 2015. <http://www.akparti.org.tr/english/haberler/unemployment-drops-to-10.6-percent-in-march/76104>，2015-06-16。

政治的碎片化和极化特征将愈加明显，各方仍将围绕着制定新宪法、库尔德问题、对外政策等问题展开竞争和博弈，正义与发展党要实现其在选举宣言中提出的各项目标亦会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但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言，“在土耳其，不同文明之间的长期交往，已经在存异而求同的道路上，出现了多样化统一于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向。”^① 两种对立的文明在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内部交往中，虽不时有冲突和分歧，但总的来说是处于一种容忍、让步和合作的状态。^② 两种文明之间的交往过程仍在继续，亦遵循着文明交往的基本规律。

Researches on the Conservative Democracy Idea and Political Reforms of AKP in Turkey

Zhu Chuanzhong

Abstract: As the AKP's guiding political idea, the key perceptions of "Conservative Democracy" include the views of the state, government, politics, democracy, secularism, religion, society and economy. Under this idea, AKP government of Turkey has carried out a number of political reforms, referring to 1982 constitution, common law, judicial branches, the administrations and the civil - military relations. As to its effect, while consolidating Turkey's democracy,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is country haven't been revolved complet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change of Civilizations Theory, AKP's political idea and its reforms accord with the laws of the exchange of civilizations. However, the Turkish Model can't be duplicated in other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Key Words: Political Governance; Turkey; AKP; Conserv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Reform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① 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第373页。

② 同上书,第374页。